

Architecture

Democracy



[美]迪耶·萨迪奇 海伦·琼斯 著

#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 建筑与民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

# 建筑与民主

[美] 迪耶·萨迪奇 (Deyan Sudjic)

海伦·琼斯 (Helen Jones) 著

李白云 任永杰 译

校译：祁潇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与民主 / (美) 萨迪奇 (Sudjic, D.), (美) 琼斯 (Jones, H.) 著；  
李白云，任永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书原名：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

ISBN 7-208-06266-8

I. 建... II. ①萨... ②琼... ③李... ④任... III. 议会—行政建筑  
—建筑史—研究—世界 IV. TU-09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897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策 划 王志钧

责 任 编 辑 王志钧



世纪文景

---

### 建筑与民主

[美] 迪耶·萨迪奇 海伦·琼斯 著

李白云 任永杰 译 祁 潇 校

---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1

字 数 136,000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266-8/TU · 2

定 价 48.00 元

---

# 建筑与民主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



世纪文景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

——丘吉尔



# **Architecture and Democracy**

- 1 序
- 4 第一章 民主的先驱
- 16 第二章 古典主义的复兴
- 48 第三章 民族认同在建筑中的体现
- 70 第四章 威斯敏斯特的形成
- 100 第五章 英联邦议会
- 106 第六章 古典与现代之更替
- 126 第七章 民主的剧院：欧洲的议会建筑
- 132 第八章 威尔士国民议会
- 138 第九章 苏格兰议会的起源
- 150 第十章 苏格兰新议会大厦的形成

# FOREWORD 序

早在 2500 年前，人们就开始在集会中践履民主原则。民主辩论赖以发生的场所乃是人类对民主理想的自然表达。民主诉求，亦即公民享有参与影响其日常生活政治决策的权利，渗透到建筑中，一些耗费巨资、近乎完美的建筑作品便随之诞生。议会建筑时刻唤起人们对民主和主权的热望。

本书要探讨的是议会和议会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些集会场所的外部结构和内部布局沿袭古制，为民主实践提供了平台，而它们试图表征的正是民主和主权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色的议会建筑都成功地抓住了这样一种精神，即建筑的意义在于为人服务，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和奥古斯塔·普金（A W N Pugin）设计的威斯敏斯特宫和美国首都巨型的国会大厦就是典型。服务于民主理想的建筑模式，创造出了多变的建筑结构，从坐落在昌迪加尔、巴西利亚以及达卡的乌托邦建筑，到德国国会大厦之类新近修缮的历史建筑，都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建筑在 21 世纪初的三个代表作品都将在英国完成。1998 年 1 月 26 日，苏格兰事务大臣唐纳德·德瓦（Donald Dewar）宣布，政府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为建造新的苏格兰议会大楼选择建筑界的顶级设计团队。最后，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勒斯（Enric Miralles）和英国 RMJM 公司竞标成功。这座正处于爱丁堡建造之中的苏格兰议会建筑群将成为苏格兰的国际标识和议会恢复的象征。

1998 年 10 月，卡拉汉勋爵（Lord Callaghan）推荐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主持的建筑师事务所（Richard Rogers Partnership）



设计威尔士国民议会大厦。这座通透的议会大厦在加的夫海湾建造完成，并于2003年对外开放。设计过德国国会大厦的英国设计师福斯特勋爵（Lord Foster），则在泰晤士河南岸建造伦敦市长的大伦敦主管机构（Greater London Authority）大楼。

政府的进步不同程度地受到它所处的建筑的影响，反过来，议会建筑又折射出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在砖瓦灰泥或钢筋混凝土建成的议会建筑里，政治家们讨论议题，各抒己见，偶尔相互攻击；规则的制定与破除、影响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构架也在其间产生。建筑设计提供了一个仿如剧场舞台的政治辩论场所。

1941年，英国下议院在“不列颠之战”的大空袭中严重损毁；1943年10月，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重建问题的讨论中说道：“我们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过来也影响了我们。”丘吉尔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愿望，即按其被炸毁之前的样式重建了议院，“英国议会建筑的全部特质在于下院是长方形的而不是半圆形的结构。”

议院作为合法集会的场所，在民主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英国和它的一些殖民地议院采用的是面对面的席位设计——英国国会的会议厅原为威斯敏斯特宫的礼拜堂，至今还保留着唱诗班的坐席，而西方民主制国家多青睐半圆式的席位安排。如剧场的半圆形阶梯座位，在古典时期便有先例，它确保出席的人能看到其他人，并听清楚其他人的发言。半圆形场地的座位安排根据国家的偏好各有不同，一般是按政党分组来坐。举例来说，在德国，所有议员都安排在特定的位置上，而欧洲议会的议员们一般都按党团来坐。俄罗斯和一些东方国家则倾向于另一种方式，以俄罗斯国会下院杜马为例，其坐席



设置像教室那样，内阁成员坐在讲坛后面，面朝着选任代表。

议会建筑的外貌折射出国家传统和民主抱负，而议会建筑的整体折射出国家看待自身的方式，更确切地说，它们以空间形式反映了一个国家希望自己如何被看待。建构新的议会大厦用以容纳新兴民族国家的新政府，以取代被战火毁坏的建筑；旧的议会大厦被重新整修，则标志着国家统一，扩建的部分提供给日益增多的专职议员使用。

尽管 20 世纪出现的新型议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议会却少有固定的建筑模式。它们通常设在那些发生政治演进和国家动荡等历史片段时被改造过的建筑中。这些建筑中有序和无序、戏剧性和惯性的场景折射出国家的政治状态。1945 年 5 月 1 日，苏军占领德国国会大厦的政治风暴被认为是那个苏维埃时代的写照。这栋建筑则见证了那个历史瞬间。

1960 年 10 月 12 日，赫鲁晓夫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大发雷霆，以至于“皮鞋敲桌”，可惜有关胶片已经丢失。马德里议会大楼的天花板上留下了 1981 年 2 月 23 日那天叛乱分子的机枪弹痕；1987 年 8 月 18 日，斯里兰卡总统贾亚瓦德纳 (Jayewardene) 在向全国广播讲话时，一枚手榴弹在新的国会大厦爆炸，总统当场喋血；意大利议会保留着长达几小时的议员殴斗胶片。相反，威斯敏斯特宫上下两院经常出现几排坐席空缺的局面，暗示着政策制定与议会程序的脱离。正如英国工党政治家汤尼·本 (Tony Benn) 说的，“我们见证了议会的衰落”。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议会权力的衰落，议会在电视中的出镜率却在增加。这也表明，面对面的席位设置较之于剧场式半圆形席位更易于产生温和政治。



Chapter one

# 第一章 民主的先驱

## **Democratic precedents**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人手中……在这里，每个人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还有整个城邦的事务：即使特别忙于处理自身事情的人也非常了解当前的一般政治事务。这就是我们的特性：一个不关心政治事务的人，我们不说他是只关心自己事情的，而说他根本就无所事事。

——伯里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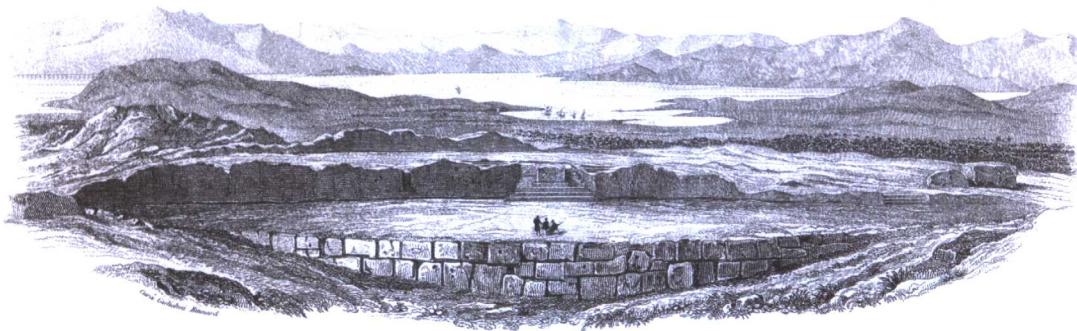
自古以来，基于广泛民主原则而建立一个普世文明的古典理想就主导着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古典民主不仅影响了后世宪法的形成，也创造了一种建筑上的传统，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支配着议会建筑的外形与风格。另一种非传统形式的先例则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冰岛。这种特色鲜明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政治传统，是逐渐从维京人的定期露天集会中发展成型的，它可以被看作议会建筑方面一种更加具体的民族方式的根源。

实际意义以及象征性意义上的民主社会的先例都起源于2500年前的雅典。“民主”(democracy)来源于希腊文的“demokratia”(demos意思是人民或者公民，而kratos则有统治之意)，表示的是一种治理的形式或方法，其中，人民要么像在古希腊的小型城邦国家中那样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要么像英国议会中选举出的成员那样，通过议会代表来治理公共事务。

古希腊人创造了一个十分有组织的文明，它基于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以及对于法律和正义的尊重这样的政治理想。这些信念共同塑造了西方的政治观，那种认为人类是“个体”并且拥有“权利”的现代自由观念，就直接来自于古典希腊民主的各种原则之中。公元前8世纪期间，随着城邦(polis)在古希腊的兴起，城邦生活的准则也随之形成。我们的政治词汇，从“政治的”一词开始，几乎所有的都来自古希腊的城邦，这些城邦作为明确的政治独立的共同体进行运作，拥有自己专有的领土，并且存有将邻邦殖民化的野心。

参与各种城邦事务是古希腊“公民”概念的核心部分。获得公民身份有严格的条件：在雅典，公民完全由具有纯粹雅典血统的成年男性组成。女性、奴隶以及外来居民都被排除在这个公民资格认证体系之外；伯里克利时期，

①雅典普尼克斯山，最早的政治集会场所之一，位于雅典卫城西侧的普尼克斯山坡上。





①雅典普尼克斯山，为雅典的政治集会提供了适宜的场所，与山坡上的自然风景融为一体。

对取得公民身份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并且父亲是雅典公民的男子才可以成为公民。

古希腊人是第一个以“公民”为基础创建社会的民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公民就是参与“评判并且担任公职”的人。拥有公民身份意味着可以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其中包括立法与司法活动。这种允许每个公民直接参与的政体，与先前任何一种政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isonomia”（平等权）——受到平等的尊重和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对待——的信念，使得雅典的公民能够抵制并且推翻暴政或者个人独裁，能够像希腊人说的那样，把政治权力“置于中心”。这也就是说，把权力从皇宫的封闭世界中转移到集会的市镇广场（Agora）中，曾经秘密操作的决策过程也为公共辩论取代。政治权力已经变成了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而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

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回忆了伯里克利所作的著名的葬礼演说。它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是如何运行的，并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对雅典公民来说，民主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人手中……在这里，每一个人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还有整个城邦的事务：即使特别忙于处理自身事情的人也非常了解当前的一般政治事务。这就是我们的特性：一个不关心政治事务的人，我们不说他是只关心自己事情的，而说他根本就无所事事。

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也许并不认为妇女、奴隶和外国人值得获得公民权，但是那些有足够的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人，确实享受到了城邦民主制政府的最初繁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享有同等的机会在城邦的政治集会上发言。重要的决策要在公共论坛上辩论，并且要接受所有公民的投票。公元前4世纪，公民的权利以及规模意味着政治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而雅典人通常在雅典卫城（Acropolis）西面的普尼克斯山（Pynx）半圆形的山坡上集会。但其实，按照组织城邦的逻辑方法，为了民众集会而选择这个地点与增建一座造价昂贵的观众席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普尼克斯山被设计成一个半圆形的砖石建筑，在这个建筑的基础上则形成了一个十分高大的挡土墙（retaining wall），它支撑着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剧院式结构。在半圆形的中心地带，矗立着一块立方体的岩石，宽11英尺，高5英尺，两旁都有一段台阶可以通往岩石的顶部；库尔提乌斯<sup>[1]</sup>推测这块区域最初可能是供奉宙斯的圣坛，也可能是演说家的讲坛。它的形状确保了每一个参加者不仅能看到发言的人，也可以看到其他出席的人。

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允许所有的公民为了立法及其他目的定期集会。公民享有主权，也就是说，他们在参与立法和司法事务中享有最高权威。这种人民的最高集会在雅典被称为公民大会（Ekklesia），在斯巴达也被称为公民大会（Apella），在古罗马有时被称为百人大会（Comitia Centuriata），有时被称为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在大的城邦，比如雅典，有好几千人参加这样的会议。每一个与会者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席位，而分配规则是根据他们效忠于哪个部落。就这样，大众民主集会的理想得以确立。然而，雅典的民主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治理模式。虽然有些地方官员有类似议会代表的

<sup>[1]</sup> 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德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曾领导奥林匹克遗址的发掘工作。  
——译者注

性质，但是，在雅典的历史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现代意义上的代议制政府的痕迹。先前作为祭祀宙斯的普尼克斯山，被人们尊为举行古代宗教仪式的场所，而雅典公民大会的会议也因之带有宗教色彩。

雅典公民大会的各次会议每九天举行一次，要求至少有6000位公民参加。在此期间，雅典的警卫便会在街道上巡逻，并用沾了红色粉末的绳子将公民们从市镇广场的最北端护送到集会场所。一旦在集会场所外发现某个公民沾有红色印记，他就会受到惩罚。在集会上，人们都代表自己发言，而不是依靠选出的代表来解决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官员们主要是从最有权势、通常是最富有的家族中选举出来的。大多数的发言者也都是学习过演讲艺术的贵族。而最好的演讲者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公民。

除了规模较小的城邦，这种大众直接参与管理的直接民主模式是很成问题的。因此，在规模较大的城邦，推举代表进行管理就变得十分必要。直接民主并非没有它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对他所谓的民主制（或共和政体）、君主制以及贵族制加以区分。在他看来，民主政体意味着大多数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统治国家，君主政体则是由一个人来统治，而贵族政体则是由少数最优秀的公民来统治。亚里士多德把直接民主看作暴民统治，这植根于他经历过的雅典民主。与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时期雅典民主理想的顶峰相比，亚里士多德时期的民主制已经大大地退化了。在这个时代，战争是司空见惯的，而政治统治也常常显得很残暴，有时甚至很腐朽。

当时的城邦一般都是由君主来统治，但是随后氏族和部落等级取而代之。随之，整个古希腊文明中的城邦以同样模式调整了各自的宪法。但是，在古典社会中，随着帝国范围的扩大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这种狭隘的民主制已经变得很难操纵。公民与非公民之间那种刻板的区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拥有上千人的不同团体居住在不远的范围内，这意味着，有资格进行定期集会的公民数量变得过大，距离也变得过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有的采用财产资格限制，而完全民主则是建立在将公民身份的范围扩展到所有成年男子或所有成年人的基础之上。近代代议制政府的精髓在于，人民并不是直接统治自己，而是定期选举那些代表他们来治理国家的代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古希腊的城邦治理模式失去了它们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在古罗马进行的又一次社会组织

形式的尝试，而后者影响了整个罗马帝国。政治学家肯尼思·米诺格 (Kenneth Minogue) 曾经评论道：“我们继承了古希腊人的思想，却按照罗马人的方式来实践……然而，所有欧洲人在继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去探索政治生活上，都受益匪浅：古希腊人的政治思想——治理以及政治本身；古罗马人的市民思想——人文、公民和文明。例如，美国的政治建筑和政治术语很显然都是罗马式的。”

和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也根据等级制度来举行成年男子的集会。在古罗马宪法中，最古老和最持久的组成部分就是元老院。起初，元老院成员一般都来自显贵家族的首脑。

古罗马元老院传奇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慕路斯<sup>[1]</sup>，他从他的臣民中选出100个成员组成了一个顾问团。到公元前509年的时候，元老院已经有300人的规模。在整个王政时期，元老都是由王选派的，而且全部来自贵族；元老一旦失去了王的宠信，那么他就会丢掉职位。王在他的统治时期，可以随意改换他的顾问，而新任的王当然可以不必再召见他的前任任命的元老。提图斯·李维<sup>[2]</sup>提及的第一位平民元老叫李锡尼·卡尔乌斯 (P. Licinius Calvus)，而在公元前401年之前，平民是不能进入元老院的。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可以通过穿着辨认元老——他们穿着带有元老标识的宽条纹无袖长袍；在罗马帝国的某些时期，元老以及他们的儿子还会穿上红色的鞋。

元老院 (Curia) 定期集会，讨论日常政治事务。元老院坐落在古罗马议事广场 (Forum Romanum) 的西侧。一般认为，元老院的会议厅最早是由伊特鲁里亚 (Etruscan) 国王托里斯·奥斯蒂吕斯 (Tullus Hostilius) 建造的。此后，在同样的地点，元老院又经多次重建，至公元前80年，元老院会议厅被集会堂 (Curia Julia) 取代。四十年后，它被一场大火所毁。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凯撒开始对其进行重建，这项工作最终由奥古斯都完成。之后，图密善 (Domitian) 对元老院进行了修缮，而在公元283年再次发生大火后，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及其后人按照最初的设计又一次重建了元老院。今天，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圣·阿德里亚诺教堂 (Church of Saint' Adriano)。

<sup>[1]</sup> 罗慕路斯 (Romulus)，传说中的罗马城建立者。——译者注

<sup>[2]</sup> 提图斯·李维 (Titus 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译者注

这座用砖砌成的建筑，高21米，表面是混凝土和大理石，上层用灰泥装饰，在城市里显得特别的醒目。元老们在一排排阶梯式的木椅上就座。首席元老坐在最靠近演讲者的前排长凳上。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元老院有将近1000人，事实上，如果所有的元老都参加会议，是没有足够的座位的。这时，等级制度在位置的安排上再次发挥作用，迫使那些位卑言轻的元老站在后面最高一排的台阶上。元老院开会的时候，门是敞开的，以便下一届元老能够了解相关的议事过程。

元老院的权力十分广泛。它掌控着外交政策，处理分散在罗马帝国各省的城市的对外关系。元老院还有约束国家行为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调动军队实施管制。传统上来讲，元老院有权协助王制定法律，出现“虚位”的时候，元老院有权代表王行使权力。推翻王政之后，每年选举产生的两名执政官代替了王的位置，但是，这个变化起初并未给元老院的地位带来任何大的变化。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元老院主要还是一个咨询机构，因而元老院只自行召集，执政官则从属于元老院的首席官员。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两个世纪里，元老院由于一次重大变革，成为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政权机构。

罗马从一个城市发展成一个帝国，其建筑语言的发展线索便在于此。

直到今天，“参议院”(senate)依然被用来描述两院制议会中的上院立法机构，而罗马元老院则被看作共和制度的伟大先驱。在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参议院作为指定的第二立法院的职责仍然保留着。在英国的立法机构中，参议院则作为上院(House of Lords)而存在。在苏格兰法律中，最高民事法院法官(Lords of Session)被称为高等法院议员，而高等法院(College of Justice)本身也被视为参议院。

从文艺复兴到当今的五个世纪里，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的建筑遗产——希腊世界中的庙宇以及罗马世界中的宗教、民用以及军事建筑——为文明世界的建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古典民主先例占据统治地位，非古典的民主先例并不为人熟知。如果说雅典是世界民主传统的发源地之一，那么斯堪的纳维亚则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冰岛的维京人(Vikings)创建了西方世界最早的基于集会的民主社会之一。在冰岛，这个集会被称为Althingi，即冰岛议会。它创始